

青春的創傷與修復

——論陳蕙貞《漂浪的小羊》與文心《泥路》的戰爭記憶與成長敘事

羅詩雲

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摘要

陳蕙貞《漂浪的小羊》（1946）與文心《泥路》（1968）同於二戰時空扣合青少年的成長與啟蒙議題，卻各自組構殖民母國日本、殖民地台灣的戰時景象與家族記述。其敘事者與故事背景形成鮮明對比，且折射出作者傳記文本、經驗記憶與社會認同間的動態關係。以世代視野觀之，陳蕙貞與文心同為日治時代昭和期台灣日本語世代作家，以戰爭度過其青春期的關鍵階段，具有相似的生命經驗。而其《漂浪的小羊》與《泥路》同以兒少視角的感受思維、敘事策略和語言句式，重新詮釋和表現戰爭生活，進而刻劃戰時壓抑又亟欲建構主體的社會圖象與時代記憶。研究步驟上，本文先由二作所述之殖民國與被殖民地的兒少戰時疏散生活論起，梳理人物心理的成長變化與戰爭日常敘事；再者，討論《漂浪的小羊》和《泥路》以女性為敘事中心的家族書寫，勾勒戰時離散敘事的我群形塑與移動情境。透過兩人戰爭書寫的敘事視域，一則由兒少的特殊角度呈示被殖民者台人的戰時離散景況，一則顯現終戰後台人對戰爭記憶的歷史詮釋與文化心理。

關鍵詞：戰爭記憶、成長敘事、陳蕙貞、文心、疏散、創傷

Trauma and Repair during Adolescence:

On War Memories and Growth Writing in Chen Hui-Chen's *The Wandering Lamb* and Wen Shin's *The Mud Road*

Lo Shih-Yun

Assistant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Chen Hui-Chen's *The Wandering Lamb* and Wen Shin's *The Mud Road* were both set during the era of World War II and depict the themes of adolescent growth and enlightenment. One of them depicts war scenes and family narratives in the colonizer state of Japan, and the other one, in the colonized space of Taiwan. The narrators and the backgrounds of these stories form contrasts and reflect the dyna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uthors' biographical texts, experiences and memories, and the formation of social identity. From the generational perspective, both Chen and Wen shared similar life experiences. They were both Taiwanese authors in the Showa period who belonged to the generation that spoke Japanese, and they both spent their adolescence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World War II. Their works *The Wandering Lamb* and *The Mud Road* both narrat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dolescents to interpret life during the war using their thoughts and feelings, their linguistic syntax, and their narrative strategies. Subsequently, both works depict the social imagery and generational memories during the war that were oppressed yet desired to be represented. This study first discusses adolescent life amid evacuation during the war in the colonizing and colonized countries depicted in the two works to detail the phys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changes and growth in the characters as well as daily life during the war. Next, this

study discusses family writing centered on women's narratives in both works to depict the formation and migration of the in-group in the diaspora narrative. Through the narrative perspectives of the two writers' texts about war, the unique perspective of adolescents is used to portray the colonized Taiwanese as a diasporic group during the war, as post-war Taiwanese people's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and their cultural mentality toward wartime memories are embodied within their writings.

Keywords: War Memories, Growth Writing, Chen Hui-Chen, Wen Shin, Evacuation, Trauma





青春的創傷與修復

—— 論陳蕙貞《漂浪的小羊》與文心《泥路》的戰爭記憶與成長敘事

一、前言

二戰期間，台灣在帝國日本的戰爭圖景中，扮演連接日本本土與南洋之間海、空交通樞紐的關鍵位置，故在戰時末期成為美軍轟炸的主要地區。¹ 位處大東亞共榮圈地理中心位置的台灣，在二戰期間遭受的空襲分為四階段，含括來自當時蘇聯、美國、中國盟軍的各方攻擊，1944年前發生在台灣的空襲僅為宣示意味的行動，由1944年10月起至終戰為最密集期間，空襲成為台灣人的日常生活。² 觀察當時台灣發行量最廣的《臺灣日日新報》，自中美空軍聯手謀劃轟炸台灣的1943年夏季起，版面不乏刊載空襲防衛、疏散相關篇章；³ 日本本土方面，1944年6月起盟軍開始戰略式轟炸日本城市，東京自1944年底歷經數次大規模空襲攻勢，1945年2月起盟軍更採取燃燒彈攻擊。二戰末期日本政府面對全面的盟軍空襲，疏散民眾成為日本本土與台灣總督府最後的防範辦法，人流、物流移動與日常生活陷入困頓停擺。甚至日本防空法1943年的修訂條文，強調因防空之故，都市內的人員與建築有疏散之必要，首次出現「疏開」一詞；台灣則在1943年3月公布〈臺灣警防團令〉因應決戰體制，統合防衛團、消防組、保甲壯丁團為

1 杜正宇，〈論二戰時期的臺灣大空襲（1938-1945）〉，《國史館館刊》51期（2017.03），頁61。

2 張建俤，〈二次大戰臺灣遭受戰害之研究〉，《臺灣史研究》4卷1期（1997.06），頁153-160。

3 中美空軍依據空照圖擇定台灣的高雄港、台南基地和新竹基地為目標區。參見鍾堅，《台灣航空決戰：美日二次大戰中的第三者戰場》（新北：燎原出版，2020.02），頁124-125。檢索漢珍版臺灣日日新報電子資料庫（收錄時間：1898-1944年），以「防空」為關鍵字的文章共2,909筆，1943年3月起共507筆；以「空襲」為关键字的文章共1,539筆，1943年3月起共229筆；以「疏散」、「疏開」為关键字的文章共38筆。《臺灣日日新報》漢珍知識網：報紙篇（來源：<http://0-oldnews.lib.ntnu.edu.tw/opac.lib.ntnu.edu.tw/cgi-bin2/Libo.cgi?>，檢索日期：2021.09.23）。

警防團，翌年4月確定疏散的實施綱要。⁴二戰的空襲災害及疏散避難可謂全面影響後方民眾生活，並帶來難以抹滅的創傷記憶。基此，如何陳述戰爭經驗與記憶成為日治台灣記憶研究的重要課題，文學創作於此成為記憶所繫之處的意義媒介。

研究者指出因台灣二戰期間的殖民地境遇，以及戰爭體驗與記憶討論遭到忽略並著重前線，「空襲」在戰後台灣民眾記憶中存在著去歷史化與歷史錯置現象，形成戰爭記憶的傳承危機。⁵承前所述，陳蕙貞、文心戰後以後方戰時生活與空襲疏散為創作命題的文學文本尤具意義，同由兒少角度講述戰爭末期日本、台灣的生活日常與心路歷程，更富其獨特視角。陳蕙貞（1932-2005）出生於東京荻窪，父親為語言學者陳文彬。1946年隨父赴任台灣大學而定居台北。1948年因二二八事件，與家人離台轉赴香港。1949年於天津一家團聚，同年8月就職北平廣播電台，並改名「陳真」。1991至2000年間居留日本，擔任NHK中國語講座講師。著作除中國語教科書多種外，尚有日本名家作品譯著，著有散文集《陳真的北京通信》及《來自柳絮飄揚的北京》。本文所論之《漂浪的小羊》是陳蕙貞半自傳式日文小說，寫成於1946年全家返台前等候船位的一個月內，其後獲得台灣《中華日報》小說徵文首獎，然於二二八事件後遭到禁刊，是部深具戰時生活身影的成長小說。論者王敬翔評述此小說表現身體與心靈認同的漂泊，尤其是戰時期間兒少心理的孤寂與不安；研究者野田正彰則形容此書描繪了在東京生

4 洪致文，〈二戰時期臺北市之疎開空地帶對戰後城市街道發展的影響〉，《臺灣文獻》62卷1期（2011.03），頁240；大谷渡著，陳凱雯譯，《太陽旗下的青春物語：活在日本時代的臺灣人》（新北：遠足文化事業公司，2017.11），頁223-226。

5 歷史記憶是國族建構的重要基石，然在戰後台灣社會的脈絡中「遺忘」反倒成為創造國族的必要條件。二戰後台灣殖民狀態雖告終止，但二戰歷史被排除在戰後官方「抗戰」的主流歷史論述之外，並被中國民族主義的意識型態所切割，形成歷史遺忘的失憶症；除了前述「空襲」的去歷史化和錯置，洪郁如另指出文學可以作為戰爭記憶傳承的方式，兒童文學更提供人們在成長早期思考戰爭的空間。洪郁如，〈臺灣空襲記憶在歷史傳承上的危機與契機：以戰爭兒童文學為中心〉，《歷史臺灣》11期（2016.05），頁36-45；藍適齊，〈可悲傷性，「戰爭之框」與台籍戰犯〉，汪宏倫編，《戰爭與社會：理論、歷史、主體經驗》（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4.07），頁420-421。

活的台灣人家族生活風景與人情微妙。⁶

文心（1930-1987）本名許炳成，台灣嘉義人，省立嘉義高級農校森林科畢業，曾任職台北林業試驗所、合作金庫。1957年4月參加由鍾肇政發起的《文友通訊》，開始小說及散文的創作，1960年代之後將創作重心轉移至電視劇本編撰。文心是戰後第一代用中文寫作的台灣作家，小說創作大部分完成於六〇年代以前，擅長描寫人性感情，亦曾改寫《孤星淚》、《雙城記》、《苦兒流浪記》、《鐘樓怪人》等世界名著，前衛出版社彙編其作品為《文心集》單冊。⁷戰後龍瑛宗曾推崇文心的中文寫作能力，並譽其為「我國前途有望的新進作家」。鄭清文則形容文心文字簡練優美，善於表達人在困境中的堅毅精神。⁸描寫日治末期台灣常民生活的《泥路》，於1965年4月連載於《新生報》副刊，1968年出版單行本，是文心唯一長篇作品，深具個人自傳性。小說通篇交錯國語和台語兩種語言，以高女學生朱白蘭的視角描述二戰末期嘉義的空襲景況與疏散生活，時空以1945年5月前後的嘉義大空襲為故事背景。

二作前行研究，可見單篇討論：下村作次郎〈關於漂浪的小羊〉介紹作家陳蕙貞與小說出版緣由、內容，定位此作為出身台灣的「中國人」在日寫照；岡崎郁子〈陳蕙貞著《漂泊的小羊》之背景〉指出《漂浪的小羊》終戰後的出版富台灣文藝的發展意義，並呈現殖民地少女戰爭前後心情與台灣人的家族愛；〈戀愛小說〈紫陽花〉的周邊〉指出《漂浪的小羊》為戰後台灣人意識的第一手研究資料，陳蕙貞為戰後台灣誕生的第一位女性作家，細膩鋪述戰前、戰時至戰後的人情變化；梅家玲〈臺灣文學史外一章——《漂浪的小羊》〉論述作者的女性身分、孩童視角與戰時處於日本的位置，提供了涉及戰爭、認同、離散敘事的女性書寫文本，亦開啟中日語言的對話與混成；黃英哲〈臺灣作家的「抗戰」書寫——讀

6 王敬翔，〈離散少女，漂浪小羊：談陳蕙貞《漂浪的小羊》〉，《幼獅文藝》774期（2018.06），頁32-33；野田正彰，《陳真——戰爭と平和の旅路》（日本東京：岩波書店，2004.12），頁72-73。

7 彭瑞金編，《文心集》（台北：前衛出版社，1991.07）。

8 龍瑛宗，〈悼文心〉，《台灣時報》，1987.03.19，8版。1959年至1967年間龍瑛宗與文心曾為合作金庫上下部屬；鄭清文，〈文心〉，鄭清文等編，《文學之路》（台北：台北市政府新聞處，1998.06），頁93。

《漂浪的小羊》》提出陳蕙貞及其家人經歷是 20 世紀台灣人生命史的類型之一，小說記錄了戰時旅居日本的台人處境與日常生活；黃英哲《漂泊與越境：兩岸文化人的移動》〈序章〉論《漂浪的小羊》充滿對日本國家體制與國民性反思，提示出特別的戰時視角；豐田周子〈陳蕙貞『漂浪の小羊』に描かれた女性たち〉以擺盪於母親與妻子之台灣新女性姿態為中心，討論在日本成長的台籍少女心性，處理了終戰後台灣女性主體性問題；《泥路》研究相對罕有，僅見黃娟〈空襲下的臺灣——讀文心的《泥路》〉，此篇由作家定位、《泥路》創作意義、人物描繪、戰時生活分節立論；另為文心作家專論研究之學位論文，其一為吳佳容〈文心（許炳成）生平及其作品研究〉，探討文心創作態度、主張及小說的藝術特質，定位《泥路》為書寫戰末躲避空襲親身經歷的歷史小說；二為陳煊楸〈文心小說研究〉，視《泥路》為文心文學重心移轉期之作，具濃厚鄉土色彩，由人力動員、物資匱乏及空襲威脅進行析論。⁹

過往與現在並非全然斷裂，童年光景總在我們當下的生命藉由心智感知的召喚而片斷浮現，形成藝術創作的想像活動。¹⁰ 陳蕙貞、文心皆為日治時代昭和初

9 陳蕙貞《漂浪的小羊》與文心《泥路》前行研究，包括：下村作次郎著，黃毓婷譯，〈關於陳蕙貞《漂浪的小羊》〉，陳蕙貞著，下村作次郎、黃英哲主編，《漂浪の小羊》（台北：南天書局，2005.04），頁 3-10；岡崎郁子，〈陳蕙貞著《漂泊的小羊》之背景〉，台灣筆會編，《走出殖民陰影論文集：2004 亞太文學論壇》（高雄：台灣筆會，2005.01），頁 209-218；岡崎郁子著，林雪婷譯，〈戀愛小說〈紫陽花〉的周邊〉，《黃靈芝的文學軌跡：一位戰後以日語創作的台灣作家》（台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9.11），頁 117-142；梅家玲，〈臺灣文學史外一章——《漂浪的小羊》〉、黃英哲，〈臺灣作家的「抗戰」書寫——讀《漂浪的小羊》〉，陳蕙貞著，王敬翔譯，《漂浪的小羊》（台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5.09），頁 11-13、15-25；黃英哲，〈序章〉，《漂泊與越境：兩岸文化人的移動》（台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06），頁 3-14；豐田周子，〈陳蕙貞『漂浪の小羊』に描かれた女性たち〉，《台灣女性文學の黎明——描かれる対象から語る主体へ 1945-1949》（日本兵庫縣：關西學院大學出版會，2021.12），頁 187-215；黃娟，〈空襲下的臺灣——讀文心的《泥路》〉，台灣文學研究會編，《先人之血·土地之花：台灣文學研究論文精選集》（台北：前衛出版社，1989.08），頁 159-174；吳佳容，〈文心（許炳成）生平及其作品研究〉（嘉義：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4）；陳煊楸，〈文心小說研究〉（台北：銘傳大學應用中國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論文，2009）。

10 回憶與生命書寫本身會滲入當下情境的想像詮釋，故童年記憶的生命書寫並非等同童年意識，然而童年記憶決定主體形構的關鍵，能發展出一種生命內在的藝術轉譯力量。參見蔡淑惠，〈編序（一）〉，蔡淑惠、劉鳳芯主編，《童年·記憶·想像：在生命無限綿延之間》（台北：書林出版公司，2012.05），頁 1-5。

期出生的台灣人知識世代，戰爭末期兩人雖分別置身日本、台灣生活，成長階段卻同樣歷經日本帝國殖民的多重身心考驗。陳蕙貞《漂浪的小羊》與文心《泥路》二作的比較基點，包括創作背景皆設定為 1940 年代二戰末期階段，文本敘事設定兒少女性第一人稱，且同具作者個人生命經歷的自傳投影性質。可謂《漂浪的小羊》與《泥路》於二戰時空扣合青少年的成長與啟蒙議題，以兒少的感受形式、思維方式、敘事策略和語言句式，重新詮釋和表現戰時圖像，進而刻劃當時人物所居處的社會圖象與時代意義；¹¹ 又，研究者汪宏倫認為戰爭對內牽涉了「社會內戰」問題，不同個體與群體之間所蘊含的內在衝突狀態，更具與其他社會現象連結的問題化空間。¹² 本文所論之兩位作家以小說呈現了此一「社會內戰」在日本、台灣的發生，表現戰時極端生存情境下不同民族、群體的外在狀態與心理圖像，寄寓歷經戰爭時期高壓的文化意識與歷史記憶的創傷書寫意義。

二、戰爭與成長：殖民宗主國與被殖民地的兒少女性

日治時期台灣近代化經濟與戰備的發展，強化了南進戰略的重要性，地理位置則促使台灣成為太平洋戰爭後期的主戰場。隨 1941 年底太平洋戰爭的爆發，台灣進入了對英美宣戰的決戰時期，1944 至 1945 年美軍對內地日本、殖民地台灣空襲破壞甚鉅。由時間角度著眼，「青春」是凝定於特定時間維度的想像符碼，象徵事物的初生。¹³ 然成長於戰爭的身心經驗對陳蕙貞與文心的小說書寫，反倒令「青春」成為背負生命創傷的同義詞。本節將由疏散、空襲、勤勞奉仕等非日

11 本文使用「兒少」一語討論陳蕙貞《漂浪的小羊》與文心《泥路》二作，考量其小說界域問題牽涉複雜，戰後台灣學界概以「少年小說」涵括「青少年小說」的用語，東西學界多設定第一人稱敘事，且 11 至 19 歲的青少年為文本主角或讀者對象為特徵。參見吳玖瑛，〈第壹章 論述、界域與流變〉，《主體、性別、地方論述與（後）現代童年想像：戰後台灣少年小說專論》（台南：成功大學出版中心，2017.09），頁 25-29。

12 戰爭的研究視域除了戰爭、軍事本身，尚包括歷史變遷、人口流動、政治治理等宏觀社會現象，以及微觀層次的個人生命經驗、記憶與創傷等面向思考。參見汪宏倫，〈導論 把戰爭帶回來！——重省戰爭、政治與現代社會的關聯〉，汪宏倫編，《戰爭與社會：理論、歷史、主體經驗》，頁 9-13。

13 梅家玲，〈身體政治與青春想像——日據時期的台灣小說〉，《從少年中國到少年台灣：二十世紀中文小說的青春想像與國族論述》（台北：麥田出版社，2013.03），頁 164。

常景象的戰時書寫，析論《漂浪的小羊》與《泥路》的成長敘事與戰爭圖像。

（一）創傷的映現：戰時疏散的兒少生活

陳蕙貞《漂浪的小羊》與文心《泥路》皆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為背景，由兒少女性敘事者角度出發。殖民地台灣在總力戰體制之下，每位國民被一概納入國民防空的體制。對陳蕙貞與文心兩人而言，戰爭語境與其成長記憶是交疊相錯的，故其兒少時期的青春意識，成為日後寫作動力潛藏的情懷與精神。又書寫生命的歷程包含想像介入與窠臼泛論兩種矛盾並存的動勢，因此作者以文字召喚回憶時能出入此二者，形成了不斷移位的敘事過程。¹⁴ 加諸《漂浪的小羊》與《泥路》皆為自傳性的小說，愈見作者對記憶與想像的構築痕跡，即對戰時生活經驗的後設改寫，如陳蕙貞便言其作開篇玉華母女由上海搭船至東京的場景即是虛構。¹⁵ 尤其殊異的是文心《泥路》雖取材自作家親身戰時經歷，卻澈底改換了文本敘事者的性別，以高女學生朱白蘭為主角。童年經驗是人格養成和主體性建立的重要階段，《漂浪的小羊》和《泥路》恰藉小說人物的青春成長結合台灣戰時歷史，由書寫、改寫、覆蓋等敘事涉入來展演作者的主體性。同時，依順在兒少純真面貌與文化想像中，成為療癒歷史傷口的敘事解方。

自傳性小說《漂浪的小羊》由旅居日本的兒童田慧真之視角出發，以 1936 年到 1945 年作者一家人在日本的生活為取材構圖。若以戰爭分期為界線，《漂浪的小羊》可分成兩部分，前半部敘述東京的生活，後半部描述為了躲避空襲，一家人最後決定疏散到郊區的生活。雖然山梨、新潟疏散段落僅占小說四分之一，卻串接了主角一家流離各地的景況，接續小說開篇由上海移居東京的場景。「疏開」是和製漢語，即疏散。其意為在政府安排計劃下為避免空襲、火災等

14 許綺玲，〈「我沒有童年回憶」：我將如何啟動書寫〉，蔡淑惠、劉鳳芯主編，《童年·記憶·想像：在生命無限綿延之間》，頁 33。

15 下村作次郎著，黃毓婷譯，〈關於陳蕙貞《漂浪的小羊》〉，陳蕙貞著，下村作次郎、黃英哲主編，《漂浪的小羊》，頁 10。

損害，將都市居民及設施疏散至其他區域的行為。於日本神戶成長的林麗韞（1933-）即敘述在政府組織學童集體疏散到農村的政策下，十歲的她就離開父母寄身於京都園部。¹⁶《漂浪的小羊》所描繪的疏散行動起因於戰爭末期激烈的東京空襲，生活描寫包括新潟的學童集體疏散以及與母親、姐姐同至甲府（山梨縣）度日的內容：

許多家長牽著即將遠赴新潟的孩子到經堂小學集合。……校舍各處和已到達的人，都掛滿了寫著「經堂小學集體疏散兒童部隊」大字的白旗。……孩子們揹上行李，依序列隊從經堂站搭上了車。無法進入月臺的家屬們在鐵路兩側排成了一道人牆揮手送行。大家都萬般不捨地喊著自己孩子、兄弟姊妹的名字。¹⁷

疏散兒童集體整隊與父母家人離別的畫面令人感到盛大且離情依依，離開父母的慧真在情感影響下不禁在火車上哭起來，失去了當初抱持與同學一起快樂生活的預設心理；迎來疏散寄宿生活的慧真所面臨的是，鄉下孩子與城市疏散兒童的對立衝突、環境資源的匱乏，以及勞動服務的艱辛：「因為是『疏散兒童』就被欺負，在宿舍又吃不飽，飯越來愈少，還要做揹稻穀的粗工……集體疏散宿舍的衛生設備不齊全，令人吃驚。……在這裡甚至還不能隨便生病。」（《漂浪的小羊》，頁 155）孩子們來到新潟不滿兩個月，戰爭已令他們備嘗飢餓與不自由的苦楚。因為持續勞動而病倒的慧真，遠離家人讓其倍感孤寂，故起念願意葬身空襲之中也要與家人團聚的想法，於此顯見陳蕙貞對兒童心理的剖析精確深入。

文心自述文學藝術的創作目的在於描寫人性，反映時代、社會與人心。¹⁸《泥

16 張莉，《清水之光：祖國懷抱中的台灣女兒林麗韞》（中國北京：華齡出版社，2010.01），頁 92。

17 陳蕙貞著，王敬翔譯，《漂浪的小羊》，頁 139-140。凡正文中所援引之《漂浪的小羊》引文，以下皆於文末直接標示書名與頁碼，不另作註。

18 文心，《三對佳偶——電視劇選集（一）》（台北：東方出版社，1968.06），頁 1。

路》由高女學生朱白蘭的第一人稱視角描述戰爭空襲下緊繃的台灣社會，以白蘭一家人的疏散與戰爭末期的空襲組構情節，開篇直接切入戰時空襲與疏散生活的臨場描述與人物心理，迫近社會現實：

炸彈不斷地落在遙遠的「台灣山脈」（現在的中央山脈）那邊，一陣接著一陣地起著反響。你猜不透它們掉在那裡，但是它們的的確確掉下來了。如果碰巧掉在我們頭頂上呢？祖母會告訴你，那是命中註定了的。

深夜裡的空襲要比白天可怕，然而，實際上並不！如果不把「死」放在腦筋裡，祖母說的，你幹麼那樣瑟瑟縮縮的？原來，我們的人生就是這麼一回事。¹⁹

二戰末期盟軍的空襲行動目的是封鎖台灣，使民間人力不易徵集，阻隔產業與交通的維持，並造成個人與集體恐慌以打擊民心士氣。相較於寧靜過日的祖母視空襲與生死為命運的安排，不願疏散而固守家園，孫女白蘭則透過猜測炸彈落點的內心獨白表現對戰爭的恐懼，正中盟軍空襲行動的預設目的。作家黃娟譽文心的小說刻劃物景、人心、人性是嚴謹又動人的。²⁰《泥路》由朱白蘭的心理自白開展故事，精密寫實的描繪戰爭末期台灣所遭受的嚴密空襲，以及台灣大眾擔心害怕卻又不得不認命的複雜心理，建立起灰暗的敘事基調。

台灣自 1943 年底遭盟軍轟炸後，全島航空基地、船舶港灣、市街、工廠、交通機關受空襲次數逐漸增加。《泥路》設定描寫的嘉義，其空襲歷史始自 1944 年 10 月，起初主要攻擊目標為嘉義機場，至 1945 年 4、5 月除了攻擊台拓化學工業嘉義工場與嘉義火車站之外，也對嘉義市中心地區進行汽油彈轟炸。²¹ 對應

19 文心，《泥路》（台北：臺灣商務出版社，1968），頁 1。凡正文中所援引之《泥路》引文，以下皆於文末直接標示書名與頁碼，不另作註。

20 黃娟，〈空襲下的台灣——讀文心的《泥路》〉，台灣文學研究會編，《先人之血·土地之花：台灣文學研究論文精選集》，頁 161。

21 杜正宇，〈論二戰時期的臺灣大空襲（1938-1945）〉，《國史館館刊》51 期，頁 88-89。

戰局變化，1944年台灣實施要塞化的防空訓練，並加強都市市民婦女、小孩與老人的鄉村疏散。²²白蘭一家在父親的安排下，疏散至五舅生活的石岡村避難，白蘭與母親、弟弟暫住向人商借的台灣式黃家老屋。甫由市區疏散至石岡村的朱家人與周遭環境顯得格格不入，加上母親時常提醒白蘭姐弟留意自身身分與朱家名聲，愈使白蘭無法完全融入疏散的農村空間，猶如一個陌生人：「我聞到了這鄉村的氣味，我自覺我已經跳出了原來的生活圈子，要開始闖進一個陌生的世界了。」（《泥路》，頁13）白蘭一進入老屋便感觉自己已經逸離城市生活，視覺、嗅覺的感官感受大不相同。此生活的異樣感也呈現於《漂浪的小羊》舉家疏散至山梨生活的田家身上，面對異於以往都市的生活環境感到錯愕與不適應，平添異鄉漂流的鄉愁；此外，石岡村村民一貫的按往日步調行事，除了勤勞奉仕的勤務外未有一絲戰時氣息的侵入。戰爭下的安寧甚至讓鄉民好奇轟炸的感覺，詢問白蘭一家的城市經驗。這樣的環境氛圍更令村人們另眼看待對時局審慎、敏感的白蘭母親，包括其寬肥長褲、膠底布鞋、長袖毛衣的一身防空穿束以及謹慎的言行舉止。

若以青春想像對應人生現實階段，「孩童」是人生的蒙昧期，「少年」則是具有能動驅力的成長階段之階段分化。²³而成長小說透過對一個人或數個人成長經歷的敘事，反映出人物的思想和心理走向成熟的變化過程。《漂浪的小羊》與《泥路》同聚焦孩子成長過程中的重要歷史事件——二戰，此不僅是台灣國族、社會外在環境的劇烈變化，對於小說人物以及昭和期出生的戰爭世代作家陳蕙貞、文心現實人生而言，也是發生於兒童期跨越到成人期之間的關鍵階段。²⁴兩

22 大谷渡著，陳凱雯譯，《太陽旗下的青春物語：活在日本時代的臺灣人》，頁226-227。

23 梅家玲，〈導論／「青春」的文化政治學〉，《從少年中國到少年台灣：二十世紀中文小說的青春想像與國族論述》，頁18。

24 本文所論之「世代」為「歷史世代」，即透過在人格形成期之集體經驗的共同歷史變化而構成的單位，並不意味涵蓋所有其年齡範圍的人。戰爭世代最具被塑性的就是青少年期，正為本文所論文本的主角設定與作家經歷。關於歷史世代的討論，參見周婉窈，〈「世代」概念和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臺灣史的研究（代序）〉，《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台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2004.01），頁5-8。

作主角的父親都對女兒抱以汲取戰時經驗獲得自我成長的積極期待，父親尚文秉持嚴謹的教育態度，希望離家疏散的團體生活改善慧真依賴的習慣；白蘭則在疏散至鄉間一週後收到父親來信，信中除了陳述對疏散生活的關心，更鼓勵孩子掌握時代動向，於疏散的全新環境重新建立生活方式：

你們在你們人生最寶貴的時候，正巧碰上了戰爭，這是不幸，但也是幸福。生活不安定，是不幸；能夠體驗多方面的生活，是幸福。……尤其是白蘭，妳現在的年紀，對妳的人生有決定性的作用。妳的羅盤即將鑄成，現在最重要的是加倍訓練對事物的認識、理解與判斷力，務使一切思想行為不流於虛空。（《泥路》，頁 61）

作為高女學生的白蘭正值自我意識的形成，以及尋找在社會集體中情感位置的青春期，然而戰時嚴峻的社會要求和衝突令她產生困擾混亂的心理社會危機。²⁵ 父親則希望白蘭由戰時生活的獨特經驗勇敢前行，建立正確的認知與判斷力。兩個父親對子女的期許回應了《漂浪的小羊》、《泥路》本質上成長小說的設定。

除了疏散生活的不適應與戰爭束縛人們日常生活的描寫，空襲也是陳蕙貞、文心經營用筆的重要情節。空襲對於群眾的衝擊，除了物質財物的損失外，尚包括個人生理與集體心理的震撼。即防空行動之侵擾勞累、噪音累積造成的壓力，威脅之未知性、被動性，與攻擊後失去熟悉的事物等多重影響。疏散至鄉下的慧真一家於短暫往返東京與山梨時遭遇美軍的空襲，這是《漂浪的小羊》田家置身第一線的空襲現場，場景十分驚駭震懾：

25 Erikson (1963) 「心理社會發展論」(psychosocial developmental theory) 認為每個人一生會歷經八個發展衝突與危機，每個衝突的產生都是內在心理需求與外在社會需求衝突所致。而青少年的心理社會危機源於主體與環境接觸互動的關係，一方面由於自我成長的需求，希望從環境中獲得滿足，另一方面又受到社會的要求與限制，使個體在社會適應中產生心理上的困難。Erikson 稱此時期危機為統合危機。參見陳國泰，〈Erikson 的心理社會發展論在負向人格特質的中小學生輔導之應用〉，《臺灣教育評論月刊》7 卷 12 期 (2018.12)，頁 124-128。

但在到達新宿站時，突然想起音調很低但令人不快的空襲警報聲。

「空襲！」

路上的人們都因突如其來的空襲而驚叫。頭上已聽到美國戰鬥機的巨響。

人潮衝過樓梯湧向外面的廣場。

「趕快，趕快散開！聚在一起會被瞄準！」

站員拿起擴音器拼命地喊。以新宿為中心的鬧區瞬間有如煉獄。（《漂浪的小羊》，頁 171）

陳蕙貞以警報聲、戰鬥機、擴音機、民眾呻吟、金屬敲擊及炸彈爆破的聲音交錯，營造極度緊張駭人的戰爭氛圍，再搭配慧真一家人防空避難的移動速度感，組構成戰爭非日常的壓迫性畫面。此外，相對於母親玉華幾乎放棄求活的希望，慧真反而在死亡深淵的生命極限中激發出強烈的求生意志，思緒翻轉於靈魂與肉體的意義思辨，且產生企盼台灣脫離殖民統治的信念，呈現自我主體與民族意識覺醒的過程。戰時生活於日本的林麗韞 1940 年隨父親定居神戶，如陳蕙貞一樣在異鄉迎來戰爭的轟炸空襲與小學疏散生活。她回憶 1942 年轟炸過後的神戶是「被一片凝固汽油彈造成的大火的濃煙覆蓋著」，不見天日，街頭滿是燒焦的屍體。²⁶ 可知陳蕙貞、林麗韞這些內地戰線後方兒童的童年記憶，不僅被戰火貫穿，且銘刻下一種超越民族及地域的普遍性創傷記憶。

《泥路》中主角白蘭首次直接面對空襲的時刻是疏散至鄉下石岡村時，爆破的力量、環境物品的損壞、炸彈和村人的巨響與哀嚎，共同烘托出空襲瞬間的驚人動態與破壞力：

剛走進屋裡，猛的來了一陣轟炸聲，好像有人從背後推我一把，我摔倒下去；定睛一看，我們四個人都摔倒在一起，屋子裡的東西嘩啦嘩啦掉下來，玻璃

26 張莉，《清水之光：祖國懷抱中的台灣女兒林麗韞》，頁 92。

碎片摔滿地上。……又是轟轟的巨響，大地怒吼了！隔壁籬笆邊傳來鐵牛的哭聲，還有村人呼天哀地的嚎叫。我嚇得把全身緊縮成一團。（《泥路》，頁 121-122）

第一次經歷空襲的白蘭嚇到全身緊縮、不知所措。小說後段陪著祖母回到嘉義市區老家探望的白蘭，則再次遭遇 1945 年 4 月 3 日的「嘉義大轟炸」，這回更驚人的是汽油彈的破壞力，市區遭到火焰無情的全面毀滅：「人們叫天呼地地哀號著。不久機響似乎遠去了，但爆炸聲卻一聲比一聲大。……滿天濺著一抹抹的飛焰，不是從天而降，而是從地上升。它落在那裡，那裡便著了火。」（《泥路》，頁 183-184）這次的轟炸對於朱家的影響是直接又深刻的，白蘭珍貴的剪報、藏書燃燒殆盡，父親兢兢業業經營的印刷廠成為斷磚破瓦，熬過兩次災難的大家長祖母則於離家避難過程中因痼疾氣喘而亡。朱家三代所根著的精神和心理依附空間、親族人物皆遭空襲所毀，而喪失了原本穩固家族和個體的主體位置。

空襲之後，朱白蘭眼見台灣人民的家園毀滅、財物損失和傷殘死別，這是戰爭下殖民地台灣最真實的景況，也呈現文心創作的悲憫情懷與創傷經驗。《泥路》中盟軍空襲經驗、人民驚惶表情、及時行樂的想法皆在作家記憶中停格；²⁷ 因為戰爭、民族與被殖民者身分而飄泊於中國、日本、台灣的田慧真，相對較《泥路》的朱白蘭少了整體生存於戰時防空的第一線迫人景況，卻始終置身在民族差別的心理層面之傷害情境中，另見證近代日本軍國主義的醜惡面與歷史殘餘。²⁸ 錯身在軍事、民族、成長種種衝突當中的田慧真、朱白蘭，兩人親歷的政治、軍事、族群暴力積累成無法抹滅的創傷經驗；而決戰期相異的地域經驗促使兩人敘事視角分別著重民族差別的心理暴力，或是由戰時體制所衍生的社會暴力層面。此亦襯托出戰爭對大眾形成的影響是漸進且累積的；另一方面，面對烽火下生活空間

27 許俊雅，〈記憶與認同——台灣小說的二戰經驗書寫〉，《台灣文學研究學報》2 期（2006.04），頁 65。

28 野田正彰指出陳蕙貞在《漂浪的小羊》中批判了近代日本高昂的大國主義攻擊、宗教神學上的暴政與歷史捏造，以及軍閥情報操作下對中國的輕蔑等。參見野田正彰，《陳真——戰爭と平和の旅路》，頁 40。

與行事習慣的強制改變與逸離，更促發兩人對原生故鄉念想的鄉愁及建構自我主體的追尋。承前所述，《漂浪的小羊》、《泥路》二作的內容，乃藉二戰末期城鄉疏散移動所引發的人我與社群、生活型態，乃至社會體制之多重關係的描繪，呈現兒少個體與他者及外在世界的對話角力，於歷史創傷的挫敗中映現自我的精神過程。

（二）戰時修辭下的壓抑主體性

二戰是各國根據總體戰理論所進行的全面戰爭，國家以各種強制手段介入社會生活，於精神與物質上控制與動員民眾。²⁹ 加諸台灣不但是日軍南進的基地，也是日本掠奪南洋軍需回運內地的中轉港，台灣自然成為太平洋戰爭後期的爭取目標。是故，戰時台灣的民眾日常與戰爭非日常磁場是相互作用的，戰爭末期空襲的增加尤其使前線、後方的區別愈趨模糊，戰線後方情境成為另一個戰場。³⁰ 研究者汪宏倫提出「戰爭之框」以探討戰爭如何形塑人們看待世界的方式，及人的認知對戰爭發生、型態及進行方式的影響。³¹ 若以此架構對應少年小說關注的核心議題：主角主體性的發展建構與自我實踐過程，即為戰爭之框所論的戰爭如何形塑人們認知的層面問題。戰爭是一種集體暴力的極端形式，尤其台灣雖未歷經以自身為主的主權戰爭，但近現代台灣歷史始終被戰爭所圍繞，故戰爭影響下的台人主體性問題更顯複雜。加之少年小說敘事焦點常置於主角如何在個人與他

29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規模與特殊形態，改變了傳統軍事衝突原則、人們對歷史發展的想像及現代世界面貌。參見陳思宇，〈零年：現代世界誕生的時刻〉，Ian Buruma（伊恩·布魯瑪）著，白舜羽譯，《零年：1945年，現代世界的夢想與夢碎之路》（台北：紅桌文化，2017.08），頁11。

30 戰爭影響大眾日常生活的同時，日常也在抵抗戰時失序的危機。參見洪郁如，〈戰爭記憶與殖民地經驗：開原綠的臺灣日記〉，《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24期（2014.12），頁56。

31 汪宏倫提出「戰爭之框」作為分析戰爭與戰爭遺緒的概念，此識框有兩層意涵：一是由戰爭所創造出的結構框架；二是關於人們對戰爭的認知框架，藉以賦予戰爭意義，加以詮釋、記憶。戰爭之框不同於強調某一觀點的史觀，而是一種理解世界的基本架構；此外，戰爭之框的雙向框構特性，致使我們亦可於文學、戲劇、藝術等作品裡見其意義與價值的框架存在。參見汪宏倫，〈第三章 東亞的戰爭之框與國族問題：對日本、中國、台灣的考察〉，汪宏倫編，《戰爭與社會：理論、歷史、主體經驗》，頁159-216。

人、個人與群體，乃至個人與自身的折衝、協商及互動關係；³² 故在戰爭識框強大作用下，陳蕙貞、文心的小說人物受到相當程度的壓抑，而形成一獨特的壓抑性主體面貌與敘事話語。此特質見於個人與家庭、學校、社會、國家、族群等群體的動態交涉中，顯現對日本國家體制與國民性反思的敘事。³³

《漂浪的小羊》運用相當多的篇幅敘述慧真在學校人際所受的民族歧視，值得注意的是這樣的偏差態度更為戰爭時局所激化，包括教育體制的學校教師也抱有偏見，讓求學這件人生必經之事具有強大的壓力。縱然慧真以中國人的自尊和父親教誨不斷激勵自己，也曾挺身抗議被以支那人稱呼，卻未被周遭環境所接納：

為人師表卻仍有如此嚴重的民族歧視，也缺乏對中國的認識，使她心中對水島老師痛恨不已。但有這種偏差想法的卻不止水島老師一個人，老師只不過是反映了除少數人以外，大多數日本人想法的典型代表人物之一，只是剛好被一個中國少女發現。一提到「中國人」，就以鄙視的語氣說：「啊，清國奴啊。」這種不人道的觀念應該要徹底剷除才對。這不僅是慧真的想法，更是全體中國人心中的呼喊。（《漂浪的小羊》，頁 119）

對慧真而言，她的校園生活就是戰爭之框的延續，長期處在政治敵我區辨凌駕一切的社會狀態，被建構成日本國家的他者。在日生活所遭受的歧視對慧真造成絕大的心理壓力，引發內心的不甘心與悲憤情緒，她卻又對現況無能為力，這份壓抑積鬱甚至使慧真生病。然小說情節並未因慧真生病而停止民族霸凌的狀況，升上新年級後同儕態度依舊蔑視，顯現軍國主義思想對孩子灌輸的錯誤情感，尤其稚真兒童之間的欺侮愈加凸顯戰爭的極端特質。

《泥路》氾濫著戰爭修辭，軍事用語日常化，尤其呈現於人物置身戰爭軍事

32 吳玫瑛，〈第壹章 論述、界域與流變〉，《主體、性別、地方論述與（後）現代童年想像：戰後台灣少年小說專論》，頁 37-42。

33 黃英哲，〈序章〉，《漂泊與越境：兩岸文化人的移動》，頁 8。

現場的情節敘事。故事以夜間空襲開始敘述，主角僅憑聲響輕易判別遠處飛機的類別，生動描繪低空掠過的「包恩克」轟炸機宛如拖著壓力機碾過屋頂，肆虐台灣土地。故事設定在戰爭白熱化背景的《泥路》，內容隨處可見空襲警報、勤勞奉仕、戰時裝束、防空管制、物資配給、獻金運動的社會景象。1943年10月總督府公布「臺灣決戰體制加強方案」，澈底動員台灣全民投入戰備勞動，人力動員一如《泥路》所述勤勞奉仕的情況：

機場被炸後，如同上幾次一樣，又有大批男人被徵去「義務勞動」——從事挖屍與搶修跑道的工作。（《泥路》，頁104）

街上，瀰漫了濛濛白烟，是留守的市民在燒龍眼核放烟幕，試圖掩護地上建物，以蒙蔽美機的搜索。穿制服的防衛團員挨戶地指導人們焚燒。（《泥路》，頁133）

除了勤勞奉仕，1944年11月頒布學徒勤勞令，殖民地台灣的學生必須積極參與國家所需的運輸通信、衛生救援、土木建築與警備勞動等動員。1945年1月台灣進入全面徵兵時期，學生更成為軍事兵役徵集的人力來源。³⁴ 前述引文中台人投入空襲後現場的復原及掩護工作，與街頭可見的青年士兵，鋪陳出戰爭末期日軍孤注一擲的悲壯氣氛，以及於殖民地生活的台灣大眾之悲哀無奈；此部分也能對應《漂浪的小羊》田慧真疏散至新瀉後的勞動服務，身為稚齡的小學生即便物資、糧食不足，仍須穿梭山間做著鄉下孩子都不願做的「揸稻穀」，為國家全力服務、奉獻自己的時局氛圍。小說一切情節烘托出人力不分階級、年齡而全面投入生產的嚴峻外在時局，以及身為「人」活在戰爭時局下缺乏自主選擇的極度壓抑，被在位者視為政策工具。

34 鄭政誠，〈戰時體制下臺南師範學校學生的軍事訓練與動員（1937-1945）〉，《國史館館刊》41期（2014.09），頁166、170-175。

校園空間是締造學童集體共同經驗的主要場域，是社會同質化的重要機制。³⁵故學校教育向是青春成長小說經常觸及的核心取材，兩部小說關於學校人力動員與空間挪用存有相當篇幅描述。朱白蘭的大哥達明徵召成為學徒兵，且她自己親見鄉下校園內青年練習劈刺的衝擊情景，校園成為軍事訓練、身體改造的場所，而非協助學童健康成長的教育場域：

操場闢有兩百公尺的跑道，靠著矮牆有六個用稻草捆成的假人，十幾個青年男子正在練習劈刺。他們槍口上的刺刀在陽光中晃晃發光。教官是軍人，他喊一聲口令，大家便下一聲氣勢，向假人猛刺一刀。（中略）是低年級的學生們唱的，聽著他們天真的歌喉，就直覺得這是人間仙境。但劈刺的嘶殺聲，卻無情地壓蓋住這天真的歌聲。（《泥路》，頁 51-53）

白蘭與弟弟走進石岡國民學校所見的是殺氣騰騰的青年團刺刀練習，然耳邊卻傳來學生純真歌聲，視覺與聽覺的感受衝突立現心中，呈現戰爭與日常景況的拉扯；《漂浪的小羊》〈太平洋戰爭爆發〉一節慧真姐妹朝會所聽的校長訓話，則與家中收音機廣播的戰爭宣傳如出一轍，戰爭訊息無孔不入的傳送到生活每一處。爾後進入山梨高女就讀的慧真更深切感受環境氛圍的壓迫感：「課本和老師都不足，甚至壯麗的校舍有一半都被用來存放疏散軍需品，……要這些弱女子拿著竹槍，練習突擊、匍匐前進，甚至要投擲手榴彈，簡直是軍隊的操練。」（《漂浪的小羊》，頁 177-178）戰時體制下學徒奉公生活的防禦工事與軍事訓練，也讓慧真無法支撐只得休學靜養，逸離教育學習的生命常軌。政府為軍備挪用校園空間之外，學生身體的軍事操練也成為日常規訓，戰爭已全面介入社會生活環境與人民身心。

由於市區空襲頻繁的戰時氛圍，白蘭母親玉蓮的穿著、生活態度一貫顯得格

35 周婉窈，〈「世代」概念和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臺灣史的研究（代序）〉，《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頁 10。

外緊張，白蘭形容疏散時的母親神情「臉上好像套著一塊『防空頭巾』，浮動著一抹淡淡的翳影」（《泥路》，頁6），防空頭巾內外層通常採用厚實棉布，是為了防止空襲的掉落物，以及預防耳鳴之用。空襲下的生活，防空頭巾的使用成為戰時台灣人民共通的經驗。文心在小說裡則轉化戰時用品為情緒的形容語彙，生動帶出外在時空背景與內裡人物心情的修辭雙關。《漂浪的小羊》戰時修辭表現於迎接疏散兒童的車站場景：「站前廣場插滿了青年團和婦人會的旗子，且擠滿人潮？『啊，我們好像遇到出征士兵的送別會，所以才會這麼擠。』」（《漂浪的小羊》，頁143）新瀉鄉間車站插滿配合戰爭後勤服務的團體旗幟，猶如參戰士兵的送別式現場，接續迎來政府學童集體疏散計畫的主角。一送一迎之間，被壓縮的是人本身主體的價值意義，作為軍力徵用的日本青年以及為了國家生存延續的兒少群體，猶如物品被運送於城鄉各個空間安置、資源運用，為國家服務。

人都尚且如此，更遑論物資上的募集與竭盡所用。慧真鄉間疏散生活以舔牙粉撫平飢餓感與營養失調，措稻穀時掛心「原來人跌倒受傷都沒關係。就是米一粒都不能掉」（《漂浪的小羊》，頁155）的謹慎與失望，一則見出匱乏程度，一則彰顯戰爭決戰下物資全面徵用之緊迫情景。一如白蘭在軍營所見窘況：「這涼亭很有中國味道，亭前有數級石階，……美中不足的是，原來做為欄杆的鐵條都被挖走，亭柱上還有幾處很難看的窟窿。」（《泥路》，頁156）此外，疏散時乘著馬車離開嘉義城的白蘭，視線流轉與心理節奏都顯得快速且倉皇焦慮，行蹤移動鋪陳緊張感的同時，帶出人物對戰時環境的觀察：

馬車衝出了人車擁塞的西門町。晨霧倉皇地流著。滿街市民都在疏散。老幼婦孺佔了多數，有的走路，有的搭車——牛車、手板車或人力車，車上滿載粗細活兒什麼的，在一片白霧中飄忽出現又消失。……平時難得交上好運道的牛車、板車、人力車，都佔了上風。五舅說，我們又要復古了。（《泥路》，頁8）

疏散的路上難得看到汽車、馬車，因為前者配給不到汽油而停駛，後者則徵用從軍。民眾只能使用被所謂殖民現代性淘汰的古老運具，一句「我們又要復古了」道出戰爭下台人的無奈和自嘲，也呈現戰爭本身是一種無止盡的資源消耗。前述中國式涼亭的鐵條徵用與醜陋窟窿別具意涵，除了烘托台灣空間物景資源的耗竭，也意藉物品的人為破壞道出戰爭的醜惡與攫取。空間建築是人類共同的資產，也是文化傳承的重要媒介，但在戰爭大前提之下一概淪為其次的存在。

人民對二戰的凝視也保存在空間景觀之中，這些景觀可以是經驗、感受，甚至是一種意境的表現。如田慧真入學所見的校舍近半都用來存放疏散軍需品，體現戰爭對實體空間的強占挪用，加上校園內軍事化操演與軍國主義思想的言論灌輸，教育環境於充滿腐蝕性與毀壞力的戰爭話語中已然變質。戰爭不僅影響大眾當下的日常生活，也威脅、壓抑著兒少的未來發展；另，進行疏散為求安全的朱家反倒於鄉間首次遭遇空襲，強烈衝擊著逐漸習慣鄉間防空鬆散步調的白蘭身心。當朱家再度返回市區的途中，入目所及蕭條、被遺棄、荒蕪遍佈的轟炸後地點，則承載著傷亡後的崩潰、瓦解痕跡與人民苦痛情緒：

約有方里之地滿目創痕，一個個大大小小的窟窿，窟窿邊隆起的土堆上，到處有銳利的彈殼的碎片。那些彈殼的任何一塊，打在人的身上，都能致人於死。……前面路心開了一個大窟窿，附近公路兩邊的芒果樹被炸掉了半截，剩下的那塊樹幹上面留著如被銳刀割割的痕跡。（《泥路》，頁 129-130）

首次遭受空襲的石岡村不僅有人員傷亡、房屋田地毀損，更悲痛的是失去親友的內心傷口。文本空間展現了時間破壞與戰爭文明死滅的見證，標誌破碎、脆弱與人類生命的有限。戰爭是形塑人類歷史的重要力量，陳蕙貞、文心在自傳性小說聚焦了決戰戰備與空襲時、轟炸後的各式景觀，藉以召喚己身掩埋的歷史記憶，於敘事中表徵戰爭期間產生的種種傷亡、迫害與暴力的歷史辯證性，顯露著深受政治暴力影響者的內心傷痛。

承前可知，《漂浪的小羊》、《泥路》皆對戰爭極端暴力性對人的主體壓抑展開書寫，然文本內哀悼與憐憫對象並不限於台灣人，對日本人的傷亡與受苦也給予人道主義式的同情，如陳蕙貞所述「即使是好戰的日本人，像這樣要最愛孩子集體疏散，也會造成父母最大的痛苦。所以日本人藉此也多少了解了戰爭帶來的辛酸吧」（《漂浪的小羊》，頁 162），以及疏散地鄰居鶴谷感嘆戰爭徵召兒子入伍的訴苦與對日本軍國政府不滿：「我真搞不懂東條這傢伙到底為什麼發起這場折磨全體國民的戰爭」（《漂浪的小羊》，頁 184）此敘事不僅透過台人心理，也藉日本國民之口呈現軍國主義體制對於人類壓制的歷史批判與省思，而非全部將戰責訴諸日本民族。換言之，戰爭與國家暴力所造成的傷痛，其實是台日民族的共同苦難經驗，一如《泥路》白蘭所見的日本兵也是因戰爭而改變人生的：

「真是的，」軍曹感慨無限地說：「你怎麼不當大老板，卻當巡查來了呢？」

「命！」

「哈……」軍曹張嘴大笑：「你相信起命運來了，是嗎？」

狄原沒說什麼，只陪他大笑一陣。

（中略）

我暗地裡吃了一驚，倒不是因為軍曹的說話粗魯，而是因為狄原是理髮店老板的出身，這是我料想不到的事。

車子在急駛，沉默一會後，軍曹又開口了：

「你的巴格野魯是全城著名的，那時候，做你徒弟的，沒有一天不挨你的罵。」

「不要提過去吧，田村。」

「這還是你從前的口頭禪。」

狄原哈哈大笑，好容易笑著了，說：「如果沒有這場戰爭，你現在還不是我的徒弟。」（《泥路》，頁 88-90）

奉父命回都市老家勸說祖母疏散的白蘭搭乘軍用卡車返家，途中因軍曹的談話驚訝於村中巡查狄原的理髮師出身。相較於平日猶如閻羅王般逼迫鄉人獻金的盛氣凌人姿態，因戰爭調派台灣的狄原不僅出身庶民，且對沒孩子及理髮師生活頗有感嘆，故使原本對狄原抱有負面觀感的白蘭印象深刻；此外，同車的駕駛兵也慨嘆自幼生長的嘉義市區變化，並以「灰色童年」自我形容。此段落對話暗示戰爭是不分台日民族的發揮影響，甚至是改變人的生命軌跡。

研究者王明珂認為由社會記憶觀點，一個人對「過去」的記憶反映個體所處的社會認同體系，同時牽涉主觀情感以及社會權力關係。³⁶ 陳蕙貞、文心的成長小說來自親身經歷的日常與戰爭之互動所得，映現於小說人物的生命軌跡，演繹的是決戰體制與戰火覆蓋，充斥我群離散和苦痛的青春成長與主體覺醒。戰爭與日常生活互相聯繫、互為相關，彼此隱藏、揭示和覆蓋。《漂浪的小羊》、《泥路》小說主角分別為青春階段的小學、高女學生，前者結束於在日台人迎接終戰的喜悅淚水及抒懷詩句；後者則止筆於風雨中送別運載祖母靈柩的牛車，車伕激烈的一句「我不喜歡這個鬼世界！」（《泥路》，頁 209）道盡戰爭末期台人生命的哀愁，更回應白蘭對親人的哀思與台灣土地的哀悼。戰線後方民眾雖未如士兵般直面戰火的生命威脅，但身心狀態亦時刻處在戰爭規訓與認知框架之管控中，不斷於日常與非日常的分際間瓦解、重塑。

而在前述陳蕙貞和文心書寫戰爭傷痕的相似主體修復中，亦需留意兩人作品發表時空、著述年紀和創作階段相異的落差，致其小說摻雜戰後台灣集體記憶以及個人記憶、想像敘事的不同成分。如戰後初期發表的《漂浪的小羊》顯然較 1960 年代發表的《泥路》更具鮮明的中國國族意識色彩，且寫作時僅十四歲的少女陳蕙貞文筆上也相對直白，著墨於客觀環境帶動主角個體及其家庭際遇的變化，顯露童心。文心的《泥路》則乘著 1964 年起台灣少年小說的萌芽而生，在此際創作已趨成熟的作家經營下，故事中人物的心理、行動為戰時敘事主線，

36 王明珂，〈歷史事實、歷史記憶與歷史心性〉，《歷史研究》5 期（2001），頁 142-143。

並不斷增補周遭人事群像變化；³⁷ 記憶向是體現個人與集體創傷之歷史殘跡的方式，³⁸ 尤其本文所論二作皆具有濃厚作家自傳性意味，展現陳蕙貞、文心在戰後考掘自我青春記憶的寫作意識，以及由個人、家族戰時生活體驗為題材，貼近台人歷史創傷記憶而點描市井小民的眾生圖像；此外，小說內堆砌的社會物景與人物行事，也流露兩位作者置身不同戰時空間的歷史經驗和鄉愁，以及企圖於戰後尷尬歷史處境中縫補戰時記憶缺角的遺憾，逐漸建構過往遺失的自我主體。

三、「家」的離返與對話：母系親族與不在場的父親

台灣近現代小說中青春想像與成長追索雖有殊異，卻終歸糾結對家國土地、意識型態的自我命名與掙扎。³⁹ 《漂浪的小羊》、《泥路》主角們的父親都具有鮮明的中國民族認同，相較之下慧真、白蘭尚在尋找自我定位，不斷於日本、台灣認同間擺盪、猶疑。作為台人第二代的田慧真曾生活於台灣、中國、日本三地，小說大篇幅描繪人物直面日本大東亞戰爭的日常生活與戰爭效應，然其敘事時空實際跨越了 1936 年宣戰前日常以迄 1945 年的終戰；作為《泥路》主要敘事者的白蘭通篇處於決戰時局，以祖母病逝的悲劇為故事劃下尾聲。前作共 55 小節的小說主要敘事者為田慧真，然進入 1937 年之前的敘事者則是田慧真的母親玉華，敘事者的轉換恰回應外部環境的情勢變化。陳蕙貞〈自序〉闡述著述動機：「我想描寫的，是我們台灣受日本統治時，一位臺灣少女在周遭的壓迫之下，精神上仍奮鬥不懈，堅信著燦爛黎明的到來並常懷祖國的生活，以及以她為中心的一家人的生活。」（《漂浪的小羊》，頁 27）研究者豐田周子另指出「漂浪的小羊」

37 台灣少年小說發展歷程，參見馬景賢，〈少年小說在臺灣——談少年小說的出版與展望〉，馬景賢主編，《認識少年小說》（台北：天衛文化圖書公司，1996.11），頁 196。

38 李有成，〈創傷〉，《記憶政治》（高雄：中山大學出版社，2020.09），頁 37。

39 梅家玲，〈導論／「青春」的文化政治學〉，《從少年中國到少年台灣：二十世紀中文小說的青春想像與國族論述》，頁 11-12。

實是象徵流浪中、日、台各地的少女心理。⁴⁰對作者自身而言，此部小說具備記錄青春成長、自我精神與家人生活的特別意義。

童年記憶的生命書寫做為過往生命的再現，因為寫作時空產生的縫隙，自然會滲入書寫者對當下情境的想像詮釋。成長於戰爭期的小說人物田慧真、朱白蘭，其經歷如實呈現「戰爭之框」如何存在與運作。不論苦痛歡樂，《漂浪的小羊》和《泥路》的兒少主角都在戰時疏散的離家過程中獲得成長，並以家族的移動作為主軸，回應了少年成長小說中常見「在家／離家／返家（home／away／home）」的情節結構。⁴¹《漂浪的小羊》以玉華攜女赴日為故事開篇，1936年底的西安事變曾讓慧真一家計畫離日返台，甫於日本安居落腳的玉華不禁感慨：

玉華看著兩個愛女睡著的可愛模樣，再想到我們是從臺灣到日本，日本又回臺灣，再去上海，從上海再到日本，這樣漂泊不定的一家人，如此在這兩個孩子心中，將不知魂牽夢縈的故鄉究竟在何處了。沒有幼時與祖父母自然地**和樂共處的故鄉**，在那小小的腦海中，也想不起那**山明水秀的故鄉**。而且此後又要繼續流浪，和作為生命依靠的尚文分隔兩地生活，總讓玉華感到十分恐慌。無法與他一起擁有世界上最平凡的一個**安定的家和固定的故鄉**，總是從這裡到那裡，不斷流浪，想到要像吉普賽人一樣，跟著父母一起流浪的兩個孩子，玉華的淚水不禁模糊了視線。（粗體為筆者所加，《漂浪的小羊》，頁 61-62）

玉華雖曾在日本求學，但引文所述的「故鄉」是與祖父母共處且山明水秀的台灣，

40 豐田周子，〈陳蕙貞『漂浪の小羊』に描かれた女性たち〉，《台湾女性文学の黎明——描かれる対象から語る主体へ 1945-1949》，頁 192。

41 Perry Nodelman（培利·諾德曼）、Mavis Reimer（梅維絲·萊莫）著，劉鳳芯、吳宜潔譯，《閱讀兒童文學的樂趣》（台北：天衛文化圖書公司，2009.03），頁 238-243。

漂泊的生活以及與丈夫分離的處境引起玉華內心的不安。對她而言安定的家、固定的故鄉是最大的想望，此回應了日常居所的家是情感福祉的依歸；⁴²若再對照作者陳蕙貞幼時寄養於岷江家的實際經歷，以及小說中田慧真的生活經歷，其生活中心雖是東京，小說裡卻輾轉生活於上海、神戶、東京、台灣、新潟、山梨、自由之丘、中野區等地，「家」的安定顯然始終未得。

「家」是人們生命裡最熟悉也最緊密的生活空間，呈現家屋、家庭、家等層次意義，亦為心理與文化過程的核心。⁴³個人在家當中發展自我認同，家庭成員則藉以聯繫彼此，再與社會結合。對比慧真一家的空間漂泊，「家」在《泥路》裡亦有多次城鄉間位移的狀況，隨家族內母親與祖母的所在產生變動。《泥路》故事由朱白蘭一家因空襲，由嘉義市區疏散至石崗村破題。故事開篇形成強烈對比的是拒絕離家疏散的朱白蘭的祖母，以及因經營印刷廠無法隨家人下鄉避難的知識分子父親。固守家園的兩人彷彿未因戰爭擾亂既有的生活節奏：

如果不把「死」放在腦筋裡，祖母說的，你幹麼那樣瑟瑟縮縮的？原來，我們的人生就是這麼一回事。……祖母並不作夢。她如常地過著和平時一樣寧靜的生活。花園是她的一切，她的一切就是花園。她獨自住在院子裡芒果樹邊的一間小房子裡，快有四十多年了。（《泥路》，頁1）

在死亡隨時降臨的非常狀況下，祖母反而抱持豁達的生活態度，一如往常的過日子。白蘭的母親為了等待祖母改變心意，熬到白蘭學校宣布停課才決定帶著家人疏散，然祖母卻仍決意留下。這份對故土的執著，對應小說尾聲祖母終於坦白丈夫因教授漢文，枉死於日人的刑求之下，故其一生不說日語、不與日人往來，也

42 吳玫瑛，〈想像鄉／土：洪建全兒童文學創作獎少年小說得獎作品中的地方與認同論述〉，《主體、性別、地方論述與（後）現代童年想像：戰後台灣少年小說專論》，頁164。

43 家是人類生活最重要的場所，提供生理必需與心理意義發展的依據。參見畢恆達，〈家的意義〉，《應用心理研究》8期（2000.12），頁55-56。

堅持子女接受漢文教育的行動。透過固守家園的祖母行止，以及父親否定日本自詡的聖戰與強調中國為朱家祖先來處之種種敘事，投射出《泥路》所潛藏的抗議日本殖民政權的漢民族意識；父親為自家與員工生計籌備疏散計畫，但始終留守市區、維持作息，未曾疏散；母親玉蓮即便順應疏散政策，也時刻提醒白蘭、阿昭姐弟莫忘自我出身。朱家每位成員都以自己的方式守衛或建立家園的存在，維持「家」在心理上的意義發展。

《漂浪的小羊》、《泥路》兩部小說「在家／離家／返家」之敘事核心為母系親族，特別是母親、女兒的緊密互動與處境問題。世代關係上前作主軸為母女，後者為祖孫。《漂浪的小羊》據作者經歷而刻劃出台灣（原生家庭）、日本（寄養家庭）的新女性群像，台人以兼具近代理想國民像和母親形象的玉華最為深刻，日人女性以支持丈夫社會運動的律子為典範；⁴⁴《泥路》則以竭力於戰局中保全家人的母親玉蓮與堅守家園的祖母為焦點。兒童是成人的他者，童年經驗經常在文學文本蘊含超越主流意識型態的內涵。⁴⁵兩部小說主角白蘭、慧真的認同辯證，恰呈現對戰時體制軍國主義意識由順服到抗議的象徵，反襯出戰爭之框激化下戰線後方大眾的不平之鳴。身為家族第二、三代的玉蓮、白蘭，因應時局選擇自家園疏散，依循當下的國家秩序、政策規範而行，但經歷空襲的白蘭一家最終仍選擇返回嘉義市區團聚，無疑是違逆了國家疏散政策；《漂浪的小羊》的慧真祖母同樣別住原鄉高雄，並未隨兒孫赴日居住。然與《泥路》相異的是尚文與子女都渴望返家卻無法如願，玉華與婆婆的對話道盡這番無奈：

「尚文怎麼都不回來看我？你們在這裡也比較自在吧……」

玉華很小心地回答，避免傷了婆婆的心。

「不管是尚文或是我們，當然都很想一直陪著媽媽。但因為尚文那樣的個

44 豐田周子，〈陳蕙貞『漂浪の小羊』に描かれた女性たち〉，《台湾女性文学の黎明——描かれる対象から語る主体へ1945-1949〉，頁199-203。

45 劉鳳芯，〈編序（二）〉，蔡淑惠、劉鳳芯主編，《童年·記憶·想像：在生命無限綿延之間》，頁7。

性，在這裡待上三個月的話，就會被日本警察抓走。」（《漂浪的小羊》，頁 110）

事實上，心懷革命意志的尚文在上海、日本、台灣都持續為特高所監視，僅僅回高雄一週內即遭特高盤查兩次，因此尚文母親對玉華的解釋了然於心且無言以對，只能顯露寂寞的表情，默然接受與兒孫兩地分離的現況。

「家」在文學想像中的指涉不止於血緣關係，還包括個人歸屬的社群及其所認同的國族。⁴⁶ 此兩部文本也透過主角的疏散出走，開啟與他者的關係，構築、指陳兒少主體轉化的路徑。一如都市兒童田慧真與疏散地新潟、山梨居民的生存平衡及拉鋸，以及白蘭與石岡村民眾共同生活所面臨的差異、不安與調適。家的變動與析離在《漂浪的小羊》、《泥路》文本鋪陳下，是兒少主角得以開展人際連結與建構自我主體的環境契機，一如白蘭父親所言將會發現「這一段生活的可貴」（《泥路》，頁 80）。慧真、白蘭分別在疏散至鄉下的生活中面臨現實考驗、重新立足並探問家與主體的本質。因戰爭的歷史脈絡讓離家流動成為人物對家國、社會關係網絡的辯證路徑，從社會控制的客體轉變為具主體性的自我。不同的是，《漂浪的小羊》最末迎來 1945 年終戰，田家沉浸在復歸故土所無法言喻的喜悅中，一如情節上父親尚文終能與妻女共同生活於八幡村的幸福圓滿，慧真也求得個體經驗戰爭時局的觀點與能動性；《泥路》朱家三代的祖母、父親與白蘭雖聚首家園，卻在轟炸逃難過程中面對祖母的驟逝。故事尾聲空襲警報響起時靈柩牛車伏對世界的怨懟，表現的是被殖民者的身分覺醒與自我哀悼，呈示兩部文本出版時點於 1946 年與 1968 年的相異寫作時空和敘事意識。

「在家」、「返家」的實踐不單小說主角一家，白蘭同學秋鴻的母親亦有同樣堅持：「我說過了，看家，是我和你們阿爸的責任，你儘可以做你喜歡的事情去。」（《泥路》，頁 141）即便家中經濟狀況不佳、戰火蔓延，仍盡力維護家

46 梅家玲，〈孤兒？孽子？野孩子？——從《臺北人》到《孽子》〉，《從少年中國到少年台灣：二十世紀中文小說的青春想像與國族論述》，頁 238-239。

園的完整，給予孩子發展空間；慧真的同學乙川面臨家中變故，父母接連逝世、哥哥染上惡習，乙川只得寄居伯母家。得知歷經現實磨難的乙川的身世經歷，反倒激發慧真對自我家庭幸福的感恩，凸顯「家」的人際互動與生活歸宿的意義與功能；小說對家的情感描寫扣合直接血緣關係的家庭成員，包含母女關係、慧如、慧真姐妹與白蘭、阿昭姐弟之手足關係，父女互動為另可注意的脈絡。「父親」作為之於母系親族敘事框架較少出場的角色，尚文心繫國族、社運、學術活動，白蘭父親則掛心市區的老家、事業、員工，慧真和白蘭的父親雖非時刻陪伴主角，卻對主角自我認知起了關鍵的引導，鼓勵女兒實踐「離家」把握疏散的寄宿體驗，獲得成長。從而凸顯小說將「疏散」視為一段自我探索的旅程，象徵生命個體即將獨立的意義；此外，《泥路》疏散生活的缺席者另有被徵調當學徒兵的哥哥達明，顯見決戰期大量軍事人力的補充與防衛動員，軍事戰鬥和防衛技藝變成日常的知能與義務。⁴⁷

作者陳蕙貞為家中次女，她與父親的關係實際上並不如小說緊密。首先，父親陳文彬深具男尊女卑的封建觀念，陳蕙貞 5 歲至 12 歲寄養於經濟學者堀江邑一（1896-1991）的家庭，甚至 1946 年陳家返台時，陳文彬一度決定將陳蕙貞留在堀江家，後遭母親陳灼華堅決反對而作罷。⁴⁸ 前述經驗必然對陳蕙貞與父親的關係造成隔閡，致其小說中溫情呈現的多為母親身影，父親尚文相對以愛國、堅持、嚴謹的語言學家形象現身，身為社運分子的他對學生、弱者和女性反倒溫柔親切；現實中與父親相處存有隔閡的陳蕙貞，於《漂浪的小羊》營造戰時追求家庭團聚的情節，投射她對父母的理想形象、愛的失落渴望與戰火下成長經驗的哀

47 日本政府在 1945 年 3 月頒布「決戰教育措置要綱」，除國民學校初等科外，1945 年 4 月 1 日起原則上停止學校教學。1945 年 5 月 22 日，日本政府依敕令第 320 號頒布「戰時教育令」宣布戰爭進入最後決戰階段，澈底動員所有學生從事戰時需要的空中防衛、軍需品生產與勞動工作；同時規定每所學校的教職員生需組織學徒隊，便於戰時各項軍事工作準備。台灣總督府也頒布「戰時教育令施行規則」，台灣中等以上學校學生亦需加入學徒隊。戰時學徒兵的運作和法制，參見鄭政誠，〈戰時體制下臺南師範學校學生的軍事訓練與動員（1937-1945）〉，《國史館館刊》41 期，頁 176-177。

48 1937 年至 1944 年間陳蕙貞週間生活於經堂堀江家，週末才回到陳家生活。野田正彰，《陳真——戦争と平和の旅路》，頁 28-30、53。

悼。⁴⁹ 自小於外地生活的慧真不免面臨國族認同的掙扎，一端是父親中國認同的精神影響，一端是自幼稚園起感受的種族歧視以及言語、行動霸凌。兩方的拉扯激發慧真對民族根源的探索與意識選擇；過程中，僅是小學生且身處異鄉的慧真，因周遭人們言語、肢體上的不友善態度，也曾動念改日本姓氏逃避，卻被父親以「我們可是純正的中國人」（《漂浪的小羊》，頁 131）嚴斥。⁵⁰ 這些情節揭露旅日台人家庭「在家／離家／返家」的心理空間游移，以及家人之間的親疏遠近，並投射血緣傳承至政治文化認同的複雜情結之現象。不難想像為何陳蕙貞的戰後訪談形容「對台灣的一切只有艱辛的回憶，沒有絲毫懷舊情感」，⁵¹ 充斥的盡是辛酸艱澀，而無懷念。

兩作主角在故事內都處於家的離返路徑上，個體隨家族的移動及其人際關係的營為、衝突，呈示戰爭對內牽涉的「社會內戰」問題，此即台人日語世代的主體、情感、成長啟蒙等面向思考，而非僅是集體主義式的情緒生產。《漂浪的小羊》開啟於家族的空間遷徙，結束於故鄉台灣因日本投降得以重歸祖國的歡慶。慧真一家處境可謂日治時期離散敘事的東亞情境代表，漂浪於故鄉台灣之外的帝國日本。雖然小說未寫到一家人返台種種，但由戰後陳蕙貞〈日本歸來〉可知她當時對返鄉的渴望與船旅的艱困；⁵² 《泥路》情節同樣啟始於疏散離家的集體移動，於台日相異我群的社會內在衝突中展開自我定義。然在人物家園往返的歷

49 陳文彬（1904-1982），高雄人，留學日本法政大學，爾後任教於上海復旦大學，旅日期間任職法政大學、籌立台灣同鄉會和旅日華僑總會，戰後初期延續日治時期活躍的社運活動，任《人民導報》主編，先後任職於台灣大學與建國中學校長。因二二八事件，1949年避居中國，1982年病逝。野田正彰，《陳真——戰爭と平和の旅路》，頁 18-25。

50 岡崎郁子論《漂浪的小羊》小說基調是以中國為祖國、容忍共產主義思想為認同背景，由戰後「陳蕙貞文藝出版後援會」之出版援助名單為蘇新與《人民導報》社長宋斐如為首之十一人，亦能顯現對陳蕙貞父親陳文彬的左傾思想及經濟支援。岡崎郁子，〈陳蕙貞著《漂浪的小羊》之背景〉，台灣筆會編，《走出殖民陰影論文集：2004 亞太文學論壇》，頁 211-212；野田正彰，《陳真——戰爭と平和の旅路》，頁 72-74。

51 訪談時間、地點為 1998 年 9 月 24 日東京新宿，訪談文字轉引自岡崎郁子著，林雪婷譯，〈戀愛小說〈紫陽花〉的周邊〉，《黃靈芝的文學軌跡：一位戰後以日語創作的台灣作家》，頁 140。

52 〈日本歸來〉道出終戰後在日台人返鄉的渴望之外，也描寫處境依舊艱辛，甚至生命遭受威脅的困境。陳蕙貞著，王敬翔譯，〈日本歸來（一）〉，《漂浪的小羊》，頁 193-194（原刊於《人民導報》1946.03.07）：「戰後，歸鄉士兵與『地痞流氓』所組成的不良幫派四處橫行，迫害我們中國人。……使得我們中國人的

程，令人無奈的是生命存有與價值在戰爭秩序的統制下輕如鴻毛，不光是作戰的士兵，戰場後方的大眾亦有可能隨時喪命，苟且求活於此憂慮惶恐的精神狀態。

軍事衝突受害者的療癒與復員，必須回歸當地社群與在地價值脈絡結合，才能找到永久的解決撫慰。⁵³ 對於家的詮釋，其動力一方面來自對根植的、完整的及真實的身分認同所需；另一方面，緣於家庭之於一個人的存在是重要情境及社會系統，通常是人們最基本的非正式社會支持，對生活適應亦扮演著重要作用。因此，讀者可以理解田慧真、朱白蘭即便經歷重重戰火，卻仍始終追尋「家」的所在，更表現出對戰爭所造成的苦痛之重新認識及價值。當中另需留意的是，陳蕙貞和文心的小說人物雖皆為女性，作家文心的男性身分以及陳蕙貞的女性身分仍致其小說鋪陳略有不同。《泥路》的白蘭縱然與作家文心經歷多有雷同，但兩人始終保有距離或想像空間，人物改寫幅度自然較大，不若《漂浪的小羊》的慧真幾乎與作者陳蕙貞的真實人生互為疊影。陳蕙貞、文心的戰爭兒少書寫所敘述的歷史記憶不再是蒼白的戰線後方，更不再只是集體的憤怒或悲傷，而是各自呈現戰爭記憶傳承的可能方式，提供人們回首思考戰爭的路徑。

四、結論：戰時記憶的自我修復與探尋

相對於戰爭前線與文化協力的戰時台灣社會討論，二戰末期盟軍對台空襲與疏散活動的討論，顯然在戰後台灣語境中存有去歷史化的邊緣現象；然而展現人類集體暴力形式的戰爭，是轉化既有社會結構的重要力量，並影響其同存世代的精神。本文所論之戰後第一代作家陳蕙貞、文心的戰爭書寫，鋪陳、揭露了這段

生命受到威脅。而我每一天都在引頸企盼著返回故里的日子。……我們所搭上於十六日出航的宗谷丸，是一艘航速十節，極為髒亂的小運煤船，我們必須在這連一個換氣口都沒有，有如奴隸船，僅以隔板區隔的船艙中度過了將近十天。」

53 古佳艷以非洲童兵為敘事題材的青少年傳記、小說，觀察其所反映的童年論述，帶出國際人道關懷、純真童年論述、創傷理論與治療的討論。此論提出兒少創傷書寫對勇氣和痛苦的重新認識之訊息傳遞，此視角可延伸對應本文所述兩作的寫作意識。古佳艷，〈是英雄少年？還是戰爭受害者？：非洲童兵敘事與童年論述〉，蔡淑惠、劉鳳芯主編，《童年·記憶·想像：在生命無限綿延之間》，頁 261。

台灣社會時代所忽略的人格形成期之兒少經驗形式，在書寫自己及其家族生存意志與創傷記憶之外，也透過疏散生活、家族漂泊、主體性壓抑等情節，反襯應當把人當作人的價值看待。值得留意的問題是，小說主角自青少年至青春期的自我統整與角色認同之重要階段，養成於戰爭之框的認識框架中，致其生命發展充滿外在國族與內在自我的複雜考驗與組構。兩人小說題材並非設定於向來戰爭書寫主軸的戰場或士兵，而是到達戰時社會大眾的疏散邊境、後方生活，映照出人物本身的內心世界，以兒童、少年的眼光發現日治時期台灣、內地日本社會與人間的真實狀態。意即兩人青春啟蒙與戰爭記憶是互疊刻印而成，而戰爭的毀滅性以及對人的全面操控正呼喚了認同主體的復甦。田慧真、朱白蘭於小說裡所訴說的戰爭經歷之個人創傷、集體經驗，實則映照出戰爭世代作家陳蕙貞、文心的共同生命經驗，即家園變貌與原本根著家園的主體之流離經驗，進而表現台灣人為其被殖民者身分的國族歷史創傷進行自我修復之能動性。⁵⁴

記憶在文學書寫的文化生產中並非單純的意識活動，而隱含政治、社會與文化意義。⁵⁵ 陳蕙貞與文心描寫戰時日常的戰後小說敘事與時代語境，交錯了青春／啟蒙的論述，青少年成長記憶與國族歷史演繹在小說的文學想像中互為表裡，彼此比喻。《漂浪的小羊》乘著戰後初期台灣回歸的新生氛圍與社運活動，《泥路》則順應政府國家文藝政策的浪潮，同樣突破語言轉換的困境，以生命記憶的修補和矯正道出殖民地台灣大眾的戰時悲苦和掙扎，傾訴對日治台灣時空遺留的歷史創傷與個體離散的鄉愁；另一方面，「戰爭」為陳蕙貞與文心帶來破壞與新生的契機，創傷苦楚與創作療癒二者並立於其自傳式的戰後小說文本。兩人不僅以文學文本介入過去個人生活記憶的描寫，也通過書寫強化自己的生命記憶與認同形塑，獲得生命存在的延續性體驗。藉由田慧真、朱白蘭兩位主人翁及其家族

54 歷史上各式創傷記憶的重述實為某種形式的行動主義，體現了巴特勒（Judith Butler）所言的生命脆危性，其中回憶苦難的方式之一為悲傷，牽涉記憶召喚的倫理與政治問題。參見李有成，〈創傷〉，《記憶政治》，頁 37-38。

55 李有成，〈記憶政治〉，《記憶政治》，頁 63。

的生命史，展演出台灣人身分的更迭律動與社會價值形式的變化，讀者得以一同加入一個社會共同體的想像建構過程。

創傷書寫是成就文學與歷史的一種方式，透過斷裂、破碎的歷史記憶之重組，構築國族歷史與文化傳承的重要情節。⁵⁶ 而陳蕙貞、文心戰時後方生活的小說創作討論，則於傳統戰爭研究多探討非理性的狀態之外，提出戰爭於毀滅本質下的計算與生產意義。《漂浪的小羊》和《泥路》同以決戰期的物質匱乏與空襲疏散為取材，呈現兒少創傷書寫對台人歷史和痛苦的重新認識價值。本文從戰爭記憶傳承觀點予以探討陳蕙貞與文心的戰爭書寫，考掘其文本脈絡中對創傷、主體、家的問題意識。若再扣及二人戰後的文本出版時空，可以發現所謂的失落世代對殖民歷史記憶並非緘默，而是早已將其主體問題隱現於文學文本。歷史不是靜止的存在，隨著台灣社會文化及政治氛圍的變動，戰爭末期這段相對蒼白隱沒的台灣歷史必得（或言已經）與各界公開對話。是故，就各類型之戰爭世代靠近戰爭的方式持續探尋，架構不同身分者面對戰爭的時代姿態，實為一亟需持續進行的重要課題。



56 黃心雅，〈創傷與文學書寫〉，《英美文學評論》20期（2012.06），頁VI。

參考資料

一、專書

- 大谷渡著，陳凱雯譯，《太陽旗下的青春物語：活在日本時代的臺灣人》（新北：遠足文化事業公司，2017.11）。
- 文心，《三對佳偶——電視劇選集（一）》（台北：東方出版社，1968.06）。
- ，《泥路》（台北：臺灣商務出版社，1968）。
- 台灣文學研究會編，《先人之血·土地之花：台灣文學研究論文精選集》（台北：前衛出版社，1989.08）。
- 台灣筆會編，《走出殖民陰影論文集：2004 亞太文學論壇》（高雄：台灣筆會，2005.01）。
- 吳玫瑛，《主體、性別、地方論述與（後）現代童年想像：戰後台灣少年小說專論》（台南：成功大學出版中心，2017.09）。
- 李有成，《記憶政治》（高雄：中山大學出版社，2020.09）。
- 汪宏倫編，《戰爭與社會：理論、歷史、主體經驗》（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4.07）。
- 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台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2004.01）。
- 岡崎郁子著，林雪婷譯，《黃靈芝的文學軌跡：一位戰後以日語創作的台灣作家》（台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9.11）。
- 馬景賢主編，《認識少年小說》（台北：天衛文化圖書公司，1996.11）。
- 張莉，《清水之光：祖國懷抱中的台灣女兒林麗韞》（中國北京：華齡出版社，2010.01）。
- 梅家玲，《從少年中國到少年台灣：二十世紀中文小說的青春想像與國族論述》（台北：麥田出版社，2013.03）。
- 野田正彰，《陳真——戰爭と平和の旅路》（日本東京：岩波書店，2004.12）。
- 陳蕙貞著，下村作次郎、黃英哲主編，《漂浪の小羊》（台北：南天書局，2005.04）。
- 著，王敬翔譯，《漂浪的小羊》（台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5.09）。
- 彭瑞金編，《文心集》（台北：前衛出版社，1991.07）。

- 黃英哲，《漂泊與越境：兩岸文化人的移動》（台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06）。
- 蔡淑惠、劉鳳芯主編，《童年·記憶·想像：在生命無限綿延之間》（台北：書林出版公司，2012.05）。
- 鄭清文等編，《文學之路》（台北：台北市政府新聞處，1998）。
- 鍾堅，《台灣航空決戰：美日二次大戰中的第三者戰場》（新北：燎原出版，2020.02）。
- 豐田周子，《台灣女性文學の黎明——描かれる対象から語る主体へ 1945-1949》（日本兵庫縣：關西學院大學出版會，2021.12）。
- Ian Buruma（伊恩·布魯瑪）著，白舜羽譯，《零年：1945年，現代世界的夢想與夢碎之路》（台北：紅桌文化，2017.08）。
- Perry Nodelman（培利·諾德曼）、Mavis Reimer（梅維絲·萊莫）著，劉鳳芯、吳宜潔譯，《閱讀兒童文學的樂趣》（台北：天衛文化圖書公司，2009.03）。

二、論文

（一）期刊論文

- 王明珂，〈歷史事實、歷史記憶與歷史心性〉，《歷史研究》5期（2001），頁136-147。
- 王敬翔，〈離散少女，漂浪小羊：談陳蕙貞《漂浪的小羊》〉，《幼獅文藝》774期（2018.06），頁32-35。
- 杜正宇，〈論二戰時期的臺灣大空襲（1938-1945）〉，《國史館館刊》51期（2017.03），頁59-95。
- 洪致文，〈二戰時期臺北市之疎開空地帶對戰後城市街道發展的影響〉，《臺灣文獻》62卷1期（2011.03），頁233-258。
- 洪郁如，〈戰爭記憶與殖民地經驗：開原綠的臺灣日記〉，《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24期（2014.12），頁47-82。
- ，〈臺灣空襲記憶在歷史傳承上的危機與契機：以戰爭兒童文學為中心〉，《歷史臺灣》11期（2016.05），頁35-74。
- 張建俠，〈二次大戰臺灣遭受戰害之研究〉，《臺灣史研究》4卷1期（1997.06），頁149-196。

畢恆達，〈家的意義〉，《應用心理研究》8期（2000.12），頁55-56。

許俊雅，〈記憶與認同——台灣小說的二戰經驗書寫〉，《台灣文學研究學報》2期（2006.04），頁59-93。

陳國泰，〈Erikson的心理社會發展論在負向人格特質的中小學生輔導之應用〉，《臺灣教育評論月刊》7卷12期（2018.12），頁124-131。

黃心雅，〈創傷與文學書寫〉，《英美文學評論》20期（2012.06），頁V-XI。

鄭政誠，〈戰時體制下臺南師範學校學生的軍事訓練與動員（1937-1945）〉，《國史館館刊》41期（2014.09），頁157-186。

（二）學位論文

吳佳容，〈文心（許炳成）生平及其作品研究〉（嘉義：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4）。

陳炫楸，〈文心小說研究〉（桃園：銘傳大學應用中國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論文，2009）。

三、報紙文章

龍瑛宗，〈悼文心〉，《台灣時報》，1987.03.19，8版。

四、電子媒體

《臺灣日日新報》漢珍知識網：報紙篇（來源：<http://0-oldnews.lib.ntnu.edu.tw.opac.lib.ntnu.edu.tw/cgi-bin2/Libo.cgi?>，檢索日期：2021.09.23）。